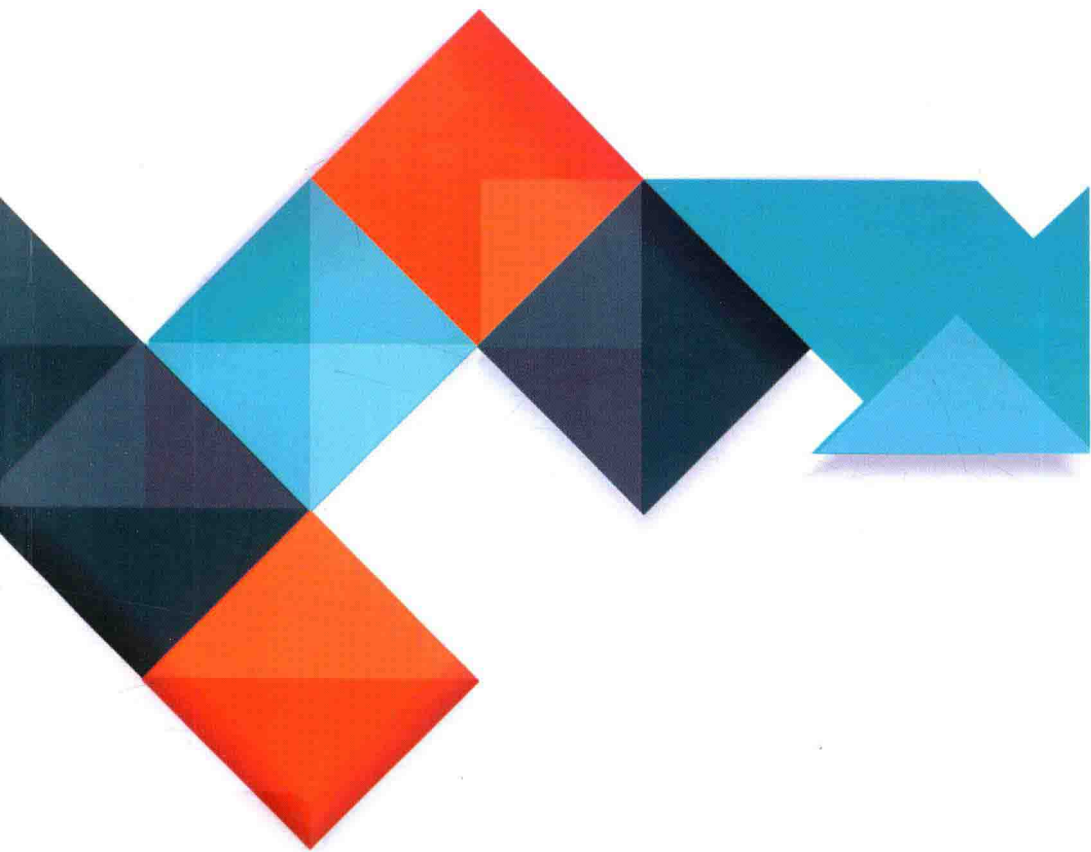


中国道路 国际话语权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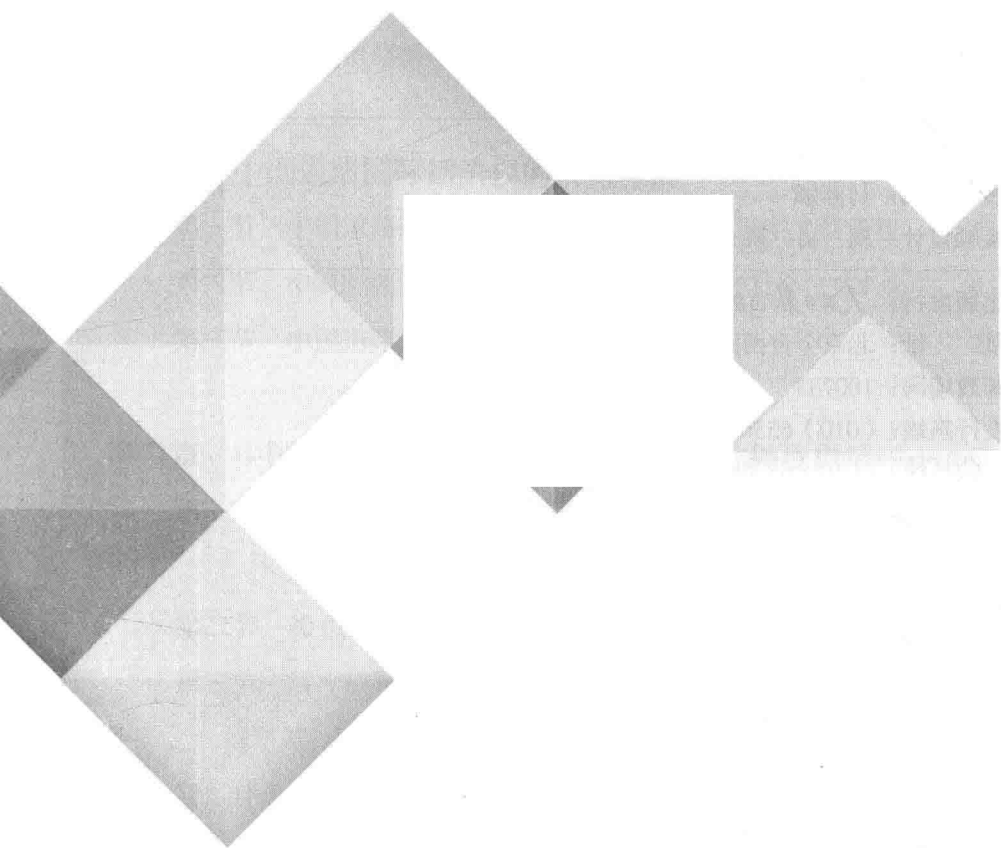
王桂芝◎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道路 国际话语权研究

王桂芝◎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研究 / 王桂芝著.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15-4856-6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对外政策—宣传工作—研究—中国 IV. ①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7901号

书 名: 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研究
著 者: 王桂芝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马苏娜
装帧设计: 刘 肖 阮全勇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2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4.25
印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4856-6
定 价: 42.00元

绪 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辟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下简称“中国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话语场，对中国道路最有发言权的国家非中国莫属。然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道路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自动转化为话语优势，在国际话语平台上鲜见来自于中国的正面话语传递，相反西方国家主导和控制了话语权。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背景，世人对于中国道路的评说千差万别，有的认为是一种进步的转型，有的则视之为背叛的“倒退”，有的认为是发展的榜样，有的则视之为进步的“威胁”。^①这种话语权错位不仅会动摇人们对中国道路的信心，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承担起与综合国力相适应的责任与义务、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道出了我们现在挨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在不少方面还没有话语权，甚至处于“无语”

^① 赵博艺：《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迷评》，《理论月刊》2015年第5期。

或“失语”状态。话语权不会自动生成和长进，国际话语权更需要我们积极培育和争取。因此，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国从国家层面越来越重视国际话语权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政府文件中关于国际话语权的阐述越来越多，越来越系统。李长春在2010年1月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示，外宣工作要“在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上迈出新步伐”，^①2010年5月9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会晤时，就加强中俄战略协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的第一点就提出：“加强二十国集团机制化问题上的协调和配合，提高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基本利益。”^②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提出了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途径和目标，即“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一文中对《决定》做了进一步的解读和阐释：“我们必须加快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坚持政府与民间并举、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并重，推动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造福人类，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让各国人民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情感和发展进程，深切感受中国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和走和平发展道

^① 中国政府网：《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李长春出席并讲话》，2010年1月4日。
http://www.gov.cn/lhdh/2010-01/04/content_1502833.htm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10-05/10/content_20002318.htm。

^② 中国网：《胡锦涛建议中俄加强协调配合提高国际话语权》，2010年5月10日。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10-05/10/content_20002318.htm。

路的真诚愿望，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新贡献。”^①这样，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与增强国际话语权联系起来，进一步凸显了国际话语权的战略地位。李长春在2012年6月出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对理论和学术上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做出了更加具体的指导性阐述，即“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②

梳理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政府文件中关于国际话语权的表述，我们发现，增强国际话语权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就已经超出了对外宣传的层面，国际话语权的内涵得以扩充，延伸到了文化层面、学术层面和思想层面；地位得以提升，国际话语权作为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议题纳入了国家整体战略层面，上升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在此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多管齐下，发出了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最强音，从全局做出了系统性的部署。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13年12月，习近平

① 刘延东：《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人民日报》2011年10月31日。

② 中国政府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李长春出席会议并讲话》，2012年6月2日。http://www.gov.cn/lhdh/2012-06/02/content_2151697.htm。

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表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提升我国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要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2015年，习近平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之际做出重要批示，希望海外版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努力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建立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并系统地阐述了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任务、方法、策略、手段和责任主体。

作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增强需要宏观与微观的紧密结合、相互支撑。来自于国家层面的阐述和定位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支持，也指明了发展方向。这就要求各个领域切实做好各自的工作，协同推进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任务。对于理论界而言，担负着国际话语权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更是重任在肩。要深入研究国际话语权基本理论，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人争取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实践经验，系统分析当前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对策，以更好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对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理论内涵与系统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归纳，使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既能拓宽中国道路的理论研究视角，加强对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战略地位的理论认知，又能从话语权的角度来考量中国道路在

国际社会遭遇的现实困境,探求突破困境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对策,从而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此外,将增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崭新课题,可以为在新的时代保持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影响提供理论借鉴。从实践层面看,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已经关系到中国能否维护和塑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有助于进一步拓宽国际话语视野,削弱西方话语霸权对我国制造的负面影响,更好地维护我国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领域的利益;在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础上,总结当前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较弱的经验教训,探讨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途径和思路,在实践中加深对中国道路以及国际政治领域软实力运作方式的认知,有效规避西方国家的不良舆论诱导;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宽松的舆论氛围,为发达国家摆脱发展困境、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有益借鉴。

二、研究现状

(一) 关于话语权与国际话语权的研究现状

话语权的研究始于西方,现今的话语权研究就是建立在西方话语权理论基础之上的。西方学者最初从话语(discourse)研究开始。有现代语言学之父之称的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提出了言语理论,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集中体现了他的基本语言学思想。索绪尔认为言语活动是由“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部分组成。语言学只能就语言而研究语言,排除任何非语言因素(如社会的、物理的、言语的……)的干扰;而就语言来说,必须区分共时和历时,语言学只研究共时的语言系统,排除任何历时因素的干扰;而就共时的语言系统的研究来

说,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实质。“语言”是互相差异的符号系统,是人类代代传习和沿用的包括语法、句法和词汇以及社会的法典、规范、标准等各种约定俗成的方面所构成的语言的系统。而“言语”则是语言的个人声音表达,指特定情况下个人说话的个别行为,包括说话者可能的或理解的全部内容。他指出,言语体系具有群体共建性。“在任何时候,言语活动既包含一个已定的系统,又包含一种演变,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的制度和过去的产物。”^①

20世纪以来,话语逐渐脱离技术层面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当代社会科学中的话语研究主要目的是赋予话语、语言以社会意义,重点揭示话语主体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话语所表现的各类规则的社会意义和政治内涵,最终指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尤其是权力关系,话语成为人们表达思想和观点,甚至影响和左右制定公共政策及进行政治决策的重要工具。

法国后现代主义学者米歇尔·福柯将分属于语言学和政治学的话语和权力这两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话语权”这个新的概念。1970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做的《话语的秩序》演讲中首次将权力理论引入话语理论,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命题——除了作为语言符号与交际工具之外,话语还是人们之间进行斗争的重要手段与目的之一,进一步地说,话语是一种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他指出,在任何社会里,权力都是为话语所固有的,权力产生话语,话语扩张权力。可见,他所开创的话语理论,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话语分析。福柯强调,他所描述的话语实践同日常的言语行为是有区别的,是一种“严肃”的言语行为,是权威性主体以某种被人们接受的方式所说的话(包括写作、绘画等),归根到底就是说话的权力,是一种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他说:“话语,意味着—

^①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9页。

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① 福柯的“话语权”这一概念提出后，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言语”二分法的语言学分析定式，使得“话语”具有了政治语境和社会价值。对西方哲学、人类学、政治学、传播学、历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理论影响，他的话语分析方法被社会学家当作一种模式。至今，人们仍在很多领域以福柯的话语权理论为基础阐述自己的观点。

英国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充分肯定了福柯对社会话语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他在批判性话语分析中认为，应具备一种“批判的语言意识”，“更加意识到构成它的社会力量和利益；更加意识到介入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更加意识到它对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的影响；更加意识到话语在文化的和社会的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包括话语的技术化）。”^②

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对话语权理论做了拓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的话语霸权理论认为，“文化霸权”是软性的，是统治阶级将其价值观推行给社会各阶级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不是硬性的暴力措施，而是依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愿认同来“软”实现的。他认为，国家的统治方式不仅仅依靠制度和国际强制机器，应该还有一个和公民社会达成共识的伦理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以文化和道德作为领导国家的规范和体系。文化之所以能有权力，是因为文化不仅代表了人的思想和信念，还可以通过控制人们的思想来达到自己的“领导权”的行使。朱佩塞为葛兰西写的传记中提到葛兰西的一个观点，“任何一个集团，任何

^① 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6页。

^② [英]诺曼·费尔克尔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中译本序），第3-4页。

一个明确的秩序，其力量不仅在于统治阶级的暴力和国家机器的强制能力，而且在于被统治者接受了统治阶级的世界观。”^①明显地，葛兰西认为的文化霸权理论上囊括了话语权。在国际交往中，文化霸权实际上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詹姆斯·罗宾逊提出了话语权力的限制，认为美国通过宣传自己的价值观缔造了一个符合自己及其他国家利益的霸权系统，先发制人的政策引起盟国的怨恨，是美国使用话语权力来合法化其霸权理念的一项失败之举。此外，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在其成名作《软实力：世界政治的成功手段（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中，约瑟夫·奈认为除了以军事、经济、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硬实力竞争之外，还有与“硬实力”相对应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包括影响力、说服力和吸引力，任何掌握话语权、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国家或组织，都可以在竞争中胜出。约瑟夫·奈关于国家软实力理论，对于重新认识主权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对新闻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构建，都具有重大意义。

与国外学术界相比，国内学术界对话语、话语权以及国际话语权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学者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关注和重视话语权方面的研究。如果在中国知网（CNKI）期刊论文中输入“话语权”一词进行篇名搜索，2003年全年仅有26篇，2016年则增至513篇；在博、硕士论文中输入“话语权”一词进行题名搜索，2003年全年仅有1篇，2014年多达42篇，2016年也有20篇。如果对“话语权”进行主题搜索，期刊论文由2003年的164篇增加至2016年的2909篇，博、硕士论文由2003年的26篇增加至2016年的736篇。相应地，对“国际话语权”进行主题搜索，期刊论文由2003年的7篇增加至2016年的934篇，博、硕士论文

① 朱佩塞著，吴高译：《葛兰西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

由 2002 年的 2 篇增至 2016 年的 216 篇。这些数字的变化证明了近年来关于“话语权”以及“国际话语权”的研究文献呈快速递增的实际情况,充分反映出中国学界对此类问题越来越重视的客观现实。通过对这些论文以及报刊媒体相关文章的阅读分析,发现中国学者对于“话语权”特别是“国际话语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话语权与国际话语权理论层面的研究。关于“话语权”与“国际话语权”的内涵、作用及组成要素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散见在很多著作及文章之中。李慎明的《领导权与话语权:“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吴贤军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理论、现状、路径》(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等著作中阐述了话语权、国际话语权的基本理论问题。相对而言,这方面的学术论文更多一些,如梁凯音的《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 年第 6 期);张国祚的《关于“话语权”的几点思考》(《求是》2009 年第 9 期);陈正良、周婕、李包庚的《国际话语权本质析论——兼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的应有作为》(《浙江社会科学》2014 年第 7 期);叶淑兰的《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辩证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7 月 21 日第 771 期)等,这些文章中都对话语权或国际话语权理论进行了专门论述。

其次是从国际传播操作层面的研究。如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是新闻传播界长期关注的重点问题,因而这一领域的学者和专家的研究成果也较多。著作方面,有程曼丽的《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张国庆的《话语权:美国是怎样取得主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媒体话语权:美国媒体如何影响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冷凇等著《新形势下媒体国际传播与话语权竞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等。论文方面也

成果丰硕,如孙英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攀登》2010年第2期);谢新洲、黄强、田丽的《互联网传播与国际话语权竞争》(《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8期);吴瑛的《如何提升网络时代的国际话语权》(《领导之友》2011年第6期);姚辛未的《中国媒体如何争取话语权》(《青年记者》2012年3月);冯峰的《美国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战略》(《红旗文稿》2014年第6期);孟威的《改进对外传播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新闻战线》2014年第7期);贾文山的《美国国际话语权策略对打造中国全球传播战略的启示》(《新闻学论集》2014年版)等。这些著述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及形式、传播载体、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方面剖析如何增强国际话语权,包括对国际传播能力较强的美国的传播战略和策略的经验总结与借鉴,对于从国际传播领域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最后是侧重话语权内容要素的研究。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对象等方面进行理论研究,重点集中在应然和实然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我国的国际话语权的现状尤其是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另一个是解决的对策、路径。具体体现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之中,论文如梁凯音的《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宽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9期);陈向阳的《有效应对西方“话语霸权”挑战》(《瞭望》2009年第13期);张志洲的《话语质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红旗文稿》2010年第14期),《和平崛起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当代世界》2012年第7期);陈玉刚的《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方略》(《学习月刊》2011年第1期);秦宣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思路》(《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1期);胡正荣、李继东的《如何构建中国话语权》(《光明日报》2014年11月17日11版),周银珍的《意识形态视域下中国国际话语权顶层设计》(《江

汉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方兰欣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制约因素、战略机遇与核心路径》(《学术探索》2016年第9期);等等。

(二)关于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研究现状

1. 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

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国外学者通常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称作“中国模式”,虽然这个提法目前在国际和国内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但这并不影响国外学者们对“中国模式”研究。自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后,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研究受到更多国外学者的关注,研究范围主要聚焦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特征以及“中国模式”的价值及发展前景等问题上。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国外学者持两种不同的观点,争论从未没有停止过。一派持否定的观点,如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原有的僵化的计划经济向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一切都处在变化中,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①英国学者里奥·霍恩在《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一文中说:“‘中国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意: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②所以不存在“中国模式”。一派持肯定的态度,学者郑永年在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学术经历和生活经历的让他认识到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在他看来,“说模式,首先就暗含承认了它是一个客观存在,这个模式不一定十全十美,它有优点,同时也有缺点。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讲,要先承认它是一个客

① [德]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是否可视为一种发展模式?——七个假设》,载于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② [英]里奥·霍恩:《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7月29日。

观存在,然后再看它的优缺点,观察它的发展,然后对它进行改进和完善”。^①

关于“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由于国外学者所持的立场和视角的不同,概括也不尽相同。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虽然不认同存在“中国模式”一说,但是他认为中国的发展确实有它独特的特征,他研究总结的中国发展特征有:“一是关于党的领导体制,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体制逐渐完善,在经历了‘转型’‘巩固’两个阶段后,目前已进入第三个阶段,即‘适应’阶段;二是关于中国体制,并非是一种同质的、像一块完整铁板的权威主义整体,而是一种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三是中国政府能够使国家成功发展,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四是实用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五是中央领导层和中央政权拥有合法性,获得广泛的信任,而地方政府则较少获得群众信任;六是关于国家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富有侵略性的、外化的意识形态,还不如说越来越多地具有对内的职能;七是中国正在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变。”^②西方舆论对中国模式特征的评述,大都认为是两点:经济自由加政治专制和压制,《澳大利亚人报》亚太版主编罗万·卡里克认为“中国模式”的特征是自由经济加威权政治,他的这种观点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普遍的代表性。^③同样,对于“中国模式”的价值及前景的评判也是褒贬不一,在此不一一赘述。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无论是从哪种角度,都对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 国内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成果日益增多,出现了研究“中

① 郑永年:《中国模式研究应去政治化》,《人民论坛》2010年第24期。

② [德]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是否可视作为一种发展模式?——七个假设》,载于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120页。

③ 张洁洁:《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评价与坚定道路自信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国模式”热。与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相比，直接研究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问题的时间较短，成果相对要少一些。在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中国道路话语权”为篇名进行搜索，共获得期刊论文7条搜索结果；以“中国模式话语权”为篇（题）名进行搜索，共获得期刊论文8条、博硕士学位论文1条的搜索结果。如果以“中国道路话语权”为主题进行搜索，自2004年至2017年共获得268篇期刊论文、259篇博硕士学位论文。总体上看，研究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数量不多，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关于中国国际话语权、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研究主要从中国道路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国道路话语权面临的问题、争取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途径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归纳起来，研究的重点领域主要涵盖了以下三类：

其一是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角度进行的研究。如徐崇温在《坚持完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一文中认为，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在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就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的问题的各个方面发表的一系列观点”。^①郭建宁的《打造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话语体系》（《学术前沿》，2012年第9期下）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中国话语体系是国际视野、中国视角、学术视阈的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打造中国话语体系，一个关键问题是处理好中、西、马的关系。丁桂馨在《中国和平崛起道路话语体系的内涵与价值》（《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道路话语体系的构

^① 徐崇温：《坚持完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主题论坛》2011年第3期。

建原则：在构建立场、方法上，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表述形式上，应充分挖掘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形成柔性表达方式；在表述内容上，应坚持从客观事实出发，塑造话语体系的真理性品质。

其二是从国际话语权角度探讨中国道路的问题。如刘志礼、魏晓文的《提升话语权视域下“中国道路”研究的思考——兼谈西方国家的“中国道路”之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4期），提出要从多重维度研究中国道路，在系统梳理和完善“中国道路”的发展路径与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揭示其演进逻辑与历史必然性；在历史文化传统、外来有益成果和现实心理需求的多元整合中探寻中国道路的国家与国际文化价值认同；使中国道路在为未来发展探索新的可能性的尝试中获得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王军旗、徐亮的《国际话语权视域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针对中国道路认同面临的现实问题，着力于提升中国道路的国际形象认同，提供话语体系理论认同，增强中国道路话语传播体系的世界话语认同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认同。

其三是整体性的研究。这类研究集中体现在相关的博硕士研究论文中，如宁波大学郭品的2012年硕士论文《软实力视域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对策研究》，着重论述了国际话语权的内涵本质，分析了国际话语权与国家软实力的内在勾连关系以及提升国际话语权对中国崛起发展的意义，并针对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缺失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以增强中国软实力的具体对策。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方会的2014年硕士论文《争取中国模式国际话语权研究》中，就中国模式国际话语权理论、中国模式国际话语弱势及争取话语权的意义以及中国模式国际话语权困境进行了分析论述，提出了争取中国模式国际话语权路径，即以政府为主导，争取中国模式的话语新局面；以社会为主体，争取中国模式的话